从一架藏书到医学信息枢纽

——美国国立医学图书馆的传承与转型

□ 苏静静

医学图书馆是保存人类医学智慧、支撑生命科学创新的核心载体，也是推动科研进步的信息基础设施。作为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学图书馆，坐落于马里兰州的美国国立医学图书馆，正是这一领域的标杆。它既是典藏医学文献与历史实物的文化重镇，也是深度嵌入全球科研日常的信息基础设施，如今研究者广泛使用的PubMed、GenBank等核心资源，均发轫于此。



从军医藏书室到国家图书馆的百年建制

美国国立医学图书馆的历史可追溯至19世纪初的美国陆军军医署。1818年，约瑟夫·洛弗尔出任美国陆军首任军医总监，他将个人藏书置放于办公室架上，供各地驻军外科军医查阅参考，成为图书馆最初的雏形。1836年，馆方账目上首次出现150美元的专项购书经费，这一年也被正式认定为建馆之年。1840年，第一份馆藏目录编制完成，全部藏书仅能摆满四层小书架，规模十分有限。

真正让这座小型藏书室脱胎换骨的，是军医约翰·肖·比林斯。1862年馆舍迁入新址后，比林斯于1865年以军医总监助理的身份主持馆务，在此后30年间，通过采购、文献交换与社会征集等多种渠道，将原本仅服务军医的内部藏书室，逐步建设为面向全美医师、兼收各国各时代医学文献的研究型图书馆。仅到1868年，馆藏已涵盖2种早期印本、17种16世纪著作、50种17世纪著作与162种18世纪著作，规模与品质大幅提升。比林斯还与军医总监巴恩斯共同确立了长远目标：收藏“本国出版的一切医学著作，以及一切有关公共卫生与国家医学的著作”——这正是“国家医学图书馆”构想的源头。

此外，比林斯留下的两项学术遗产，至今仍是世界医学史研究的基石。1879年，《医学索引》创刊，这份月刊连续出版125年，正是如今全球通用的文献检索工具PubMed的前身；1880年起陆续刊行的《军医总监办公室图书馆索引目录》，前后共5辑61卷，其数字化版本收录超过370万条文献著录，支持全文检索，构建起庞大而系统的医学文献目录体系。

在馆藏规模稳步扩张的同时，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使图书馆被列为潜在空袭目标。时任馆长哈罗德·惠灵顿·琼斯先将早期珍贵印本装箱封存于地下室，又在克利夫兰的达德利·艾伦纪念图书馆设立分馆，作为异地保存点。1942年夏起，952箱珍贵文献陆续运往克利夫兰。这批历史文献在克利夫兰分馆得到系统整理与专业保管，为后续医学史馆藏体系的建制奠定了基础。战后因华盛顿老馆空间紧张，历史特藏继续留存克利夫兰，与主体馆藏分离近20年。直至1962年春，3.5万卷历史珍本才分装4辆货车运回贝塞斯达新馆。同年5月11日，馆方在新馆楼旁栽种了一株从希腊科斯岛移植而来的“希波克拉底之树”，以纪念西方医学之父，传递医学人文精神。2014年，原树因真菌病枯萎后，馆方以克隆技术补种新株，至今仍挺立馆旁，成为美国国立医学图书馆的标志性人文景观。

制度层面的立法保障，让图书馆彻底完成了身份跃迁。1956年，艾森豪威尔总统签署《国立医学图书馆法》，图书馆从军方序列正式转入美国公共卫生服务部（后隶属于卫生与公众服务部）；1962年迁至贝塞斯达现址，1968年正式成为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的组成部分。至此，美国国立医学图书馆完成了从军方内部机构到国家法定医学信息机构的转变，馆藏体系全面走向成熟。目前，实体馆藏达数百万件，涵盖多种类型，覆盖诸多领域。其中，医学史部集中保管的早期印本、欧美与伊斯兰医学手稿、科学家档案、医学版画等特藏，价值早已超出医学本身，成为研究社会史、文化史、观念史的重要史料。

面向全球的医学信息服务枢纽

20世纪后半叶，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美国国立医学图书馆逐步向全球性医学信息中心转型，完成了从纸质典藏到数字基础设施的质变。1964年，医学文献分析与检索系统正式投入运行，是世界上首个大规模计算机化医学文献回溯检索系统，开启了医学文献检索的自动化时代；1971年，联机医学文献分析与检索系统推出，实现了文献检索的实时化；1997年，PubMed平台上线，向全球公众提供免费网络检索服务，大幅降低了医学文献的获取门槛；2000年，公共医学文献中心正式上线，构建起开放获取的医学文献全文存档体系。

与此同时，设立于美国国立医学图书馆内部的国家生物技术信息中心，承担着维护GenBank等核心分子生物学数据库的职能，成为全球生命科学研究的底层数据基础设施。可以说，美国国立医学图书馆的百年发展史，不只是馆舍扩张、馆藏增长的历史，更是医学知识从纸质索引走向数字化、开放化，从馆内借阅走向全球共享的演进史。如今，它早已超越了传统图书馆的边界，成为深度嵌入全球医学科研日常的信息枢纽。凭借领先的数字信息服务能力，美国国立医学图书馆已成为国际医学领域不可或缺的信息支撑平台，为全球图书馆的数字化转型提供了重要的实践参照。

独具价值的中国医学史料特藏

在美国国立医学图书馆浩繁的馆藏之中，东亚收藏板块的中国相关文献，是国内研究者尤其值得关注的稀缺资源，主要分为传统医学典籍与近现代公共卫生史料两大类别。

其一为中国传统医学经典馆藏，共计约2000卷，内容覆盖医经、本草、方剂、伤寒、针灸、养生及临床各科，既包含《黄帝内经》《伤寒论》《金匮要略》《本草纲目》等核心典籍的历代传本与注本，也收录了部分日本刊行或注释的汉方医籍，为中医文献版本研究、海外传播史研究提供了珍贵的参照样本。

其二为中国近现代公共卫生特藏，2006年正式入藏，共计约7000件，形式极为丰富：宣传画、卫生小报、药品广告、日历、儿童益智教具、幻灯片、照片、健康奖状等皆在其列。这批材料以20世纪上半叶至中后期为核心，涉及传染病防治、环境卫生、健康教育、妇幼健康、计划生育等多个维度，可与国内档案、报刊、口述史料相互印证，对中国近现代史、公共卫生史、社会文化史研究具有独特的补充价值。

除核心馆藏外，美国国立医学图书馆的“医学史图像库”及数字馆藏中，还可检索到大量与中国相关的药店、医师、诊疗场景、医学书籍插图等资源，历史影音资料亦可用于研究近代健康教育的传播路径。其数字馆藏平台面向全球免费开放，除特别标注外，多数内容属于公有领域，可在线阅览与下载。

从军医办公室的一架藏书，到享誉全球的医学信息枢纽，美国国立医学图书馆一方面朝向当下与未来，以数字工具支撑全球生命科学的前沿探索，成为科研工作不可或缺的基础设施；另一方面回望历史与来路，以卷帙浩繁的珍本典藏守护着人类医学发展的集体记忆。

图书馆史话

居官者巧不如拙

——“操履端醇”的廉吏顾九思

□ 杨旭辉

人物志

顾九思（1532—1610年）字与睿，号韦所，明代长洲（今苏州）人，曾被誉为“天下第一县令”。在苏州古典名园沧浪亭“五百名贤祠”中，就有他的画像，旁边的像赞用四句话概括了他一生的德行和功业：“丰城贤令，民安盗戢。内擢台垣，治行第一。”少年顾九思，勤勉好学，与同乡文元发、申时行等为“绾角”交，“同业，又同志也，遂以文字定交”。这一批苏州籍的同乡、同学、同业，后来都在朝中任职，以“操履端醇”相互勉励，相互规切。顾九思与申时行、文元发等同乡志同道合，再传至文震孟等后辈，吴门士大夫清正自持的风气一脉相承，隐然形成了有全国影响力的苏州清流群体。

隆庆五年（1571年），顾九思中进士。6月，初授江西丰城县令。接到这样的委任，亲友无不为顾九思深表担忧，“或为公危之”。因为在当时的官场上，一直有着这样的传言：“丰城号剧邑，先后令俱败去。”自从明朝立国以来，丰城县令“什且八九”都铩羽而归，更没有人能从丰城县令的位置上“台省擢者”，因而丰城县令是一个令人不寒而栗的职位。“选人当牧丰城，百计蠲免”，唯独顾九思“独欣然从命”，绝无难色。

去丰城之前，父亲顾佐对顾九思“为口画古循吏节用、爱民事”，并以“‘清、慎、勤’三者为戒”，作为官箴赠与顾九思。来到丰城，面对各种困难，顾九思丝毫“无难色”，坚持“徇吾官守”，他坦然说道：“吾知洁己爱民，严饬吏治而已，遑恤其他。”这些朴实无华的言辞，是顾九思终其一生恪守践行的诺言，也是给后世官员留下的官箴和楷范。为了实践自己廉洁自律的诺言，顾九思不仅严以律己，也和家人约法三章。在赴任丰城之前，顾九思就亲自给长子顾兆祯写信，信中写有“诫以毋暴横乡里，毋广收家奴，毋妄受投献，毋诡寄田产，毋干渎有司，毋轻与他人事，毋狎通群小，毋骄逸，毋越分，毋索子钱”等数十条，希望他们坚守“勿失”。

顾九思言行如一，在丰城县令任内，确实做到了“徇吾官守”“洁己爱民，严饬吏治”。在第一个任期内，他励精图治。在认真寻访查考、“考览风俗，究析利病”的基础上，他集中精力整治了丰城县的两大弊政：胥吏乱政以及累欠朝廷“以数万计”的税粮。

丰城县衙过去长期被胥吏把持，民间有“三不在”的歌谣：吏不在舍，卷不在房，囚不在狱。顾九思以雷霆手段整顿丰城吏治，“公为严其法”，制定严格的制度和规定，使“吏有舍，不得私出入；牍有扃，不得私上下其手；囚有狴犴，不得私纵舍”。在调查中，他发现造成丰城累欠粮税严重的原因，是地方“积棍”恶霸的长期侵占。为此，顾九思加强征收赋税管理，制定严格的库、柜管理办法，制定“授柜之法”，“定出纳之规，使监收者不得侵匿，经管者不得徇私”，遂使“奸蠹无所染指”。经过这一系列的整改，丰城旧日的“诸弊一时顿革”“四境晏然”“国课悉登”。

万历二年（1574年）的地方官员政绩考核中，“县官考丰城为天下第一”。次年，万历皇帝颁赐的升迁敕书中，对顾九思丰城任内的治绩给予高度评价，并把他作为全国的榜样，“以风天下”：“尔江西南昌府丰城县知县顾九思，器资闳雅，才谓敏明，擢自科甲之英，分符宰牧，遂以廉能之最著绩，循良政，罔不宜，民用丕变。”

万历五年（1577年），顾九思以治绩卓异选授户科给事中，开启了十余年的谏官生涯。谏官制度在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也是古代文官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历史上谏官的选拔、任用，为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政治保障。但凡担任谏官的文士，若无刚正不阿、将生死置之度外的“死谏”精神，是很难尽忠职守的。尤其在明代中后期，首辅大臣滥用权力、宦官专权日益成为朝政的弊症，在“政以贿成，官以赂授”，“群臣风靡，罔识廉耻”的历史背景下，顾九思绝对不愿尸位素餐，在任职谏官时，他曾“盟心自矢”，发誓道：“为天子司耳目谏诤，无容尸禄，尤无容市名。”

当时，有不少谏官明哲保身，“多毛举细事，弹射一二人以为名”，顾九思对这种敷衍塞责、沽名钓誉的做法提出尖锐的批评，他明确表示，自己绝对“不摭拾一二事、弹射一二人塞责”。顾九思所关注的“所言必关国体，及有裨民生者”，用顾九思自己的话讲，都是“谨持大体，纳忠造福”之事。顾九思进呈朝廷的奏文，始终遵循着“不激不随”的原则，所论皆有理有据，逻辑严谨冷峻。观其论述的言辞，充满了胸怀天下、忧国忧民的情怀。顾九思宏论天下大事的书奏文章，诸如“奏论大司马、劾黔国、沐昌祚及议和款、筹番虏先后五十余疏”，其奏疏文风剀切详明、有裨世用，无怪乎刘弘道在《顾公墓表》中要把顾九思《掖垣题稿》中的书奏文章与西汉名臣贾谊、唐代名臣陆贽相提并论：“即汉贾生、唐陆贽侃侃名议不过也。”万历皇帝对顾九思的进谏给予了很高的评价：“操履端醇，风猷俊雅。自蜚英廷对、奏绩名封，爰采荐书，抡之琐闼。尔惟奉公谨恪，矢志忠贞，晋陟今官，益勤厥职。”

晚年的顾九思在回顾自己一生为官的经历时总结为三句话：“居官者巧不如拙，速不如迟，进不如退。”并自称为“三如道人”。“巧不如拙”，体现了顾九思一生行事的诚挚态度和踏实的作风。巧与拙的辩证关系，是中国古代哲学中的重要命题，老子就有“大巧若拙，大辩若讷”的论说。《韩非子》中亦有“巧诈不如拙诚”的警世之论。这不仅成为后来儒家知识分子入仕的准则，也是很多世族的家训，代代相传，晚清名臣曾国藩还把它作为座右铭，谓：“天下之至拙，能胜天下之至巧。”

顾九思生前连续获得褒奖，在他去世后，更收获了很多亲朋故旧的高度赞扬。2018年发现的文物史料，如申时行的《顾公墓志铭》、王稚登的《顾九思行状》、文震孟的《右通政顾公传》等22块碑刻，便是其官声人品的最好印证。文震孟在《右通政顾公传》中称道这位乡贤：“盖当今完行完名，始终显晦一节，君子也。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孺子其向往焉。”这大概便是顾九思入仕之初，一代廉吏雷礼对顾九思所说的：“舆论最公，口碑具在。”

（上接1版）

严格执行向党中央请示报告制度，是保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的重要制度安排。请示报告使党中央及时掌握重大事项和实际情况，也使下级组织明确权责、避免擅自决断。该请示的不请示、该报告的不报告，可能造成各自为政；把本级能够解决的问题也层层上报，则会转移责任。执行请示报告制度，需要把职责边界分清。属于党中央决定的事项必须严格执行，属于本级职责范围内的工作则应主动负责。执行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也要如实反映，不能报喜不报忧。

《决定》把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落实情况作为政治监督的重点，要求推进政治监督具体化、精准化、常态化。具体化，就是监督要落到具体决策、具体任务和具体责任上；精准化，就是找准执行偏差的症结，不能泛泛检查；常态化，就是监督贯穿执行全过程，不能出了问题才临时追问。以高调表态代替落实，以片面极端的做法损害政策本意，都可能偏离党中央决策部署。政治监督只有同跟踪督办、质效评估相衔接，才能真正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

把提高党内民主质量落到实处

党内民主是党的生命。尊重党员主体地位、保障党员民主权利，首先要使党员能够了解党内事务、参与党内讨论、表达真实意见。《决定》要求落实党的各级代表大会代表发挥作用制度，健全党内情况通报制度、情况反映制度，就是为了让党员和党组织获得必要信息，并有正常渠道反映情况。党内民主质量，最终要看真实情况能否进入决策，合理意见能否得到认真处理。提高党的委员会、党委常委会、党组会议质量，是发扬党内民主的重要环节。会议多不等于民主充分，发言多也不等于讨论深入。提交会议讨论的议题，应当有充分的调查材料和必要的情况说明，使班子成员能够独立思考。讨论中要鼓励讲真话、讲实话、讲心里话，不能把预定结论当成讨论前提，更不能以职务高低判断意见价值。

党内民主平等的同志关系，是讲真话的重要条件。领导干部如果把分管工作、分管领域和地方当成“私人领地”，就会听不进不同意见，也容易把组织权力变成个人权力。党章党规所确定的民主原则和程序，正是为了防止个人凌驾于组织之上。《决定》明确不得压制、排挤、打击发表不同意见的同志，保护的是党员权利，也体现了党组织的自我纠错能力。不同意见未必都正确，但不让不同意见讲出来，正确意见也可能被遮蔽。充分发扬民主，目的在于实行正确的集中。毛泽东在《党委会的工作方法》中强调，“要善于团结和自己意见不同的同志一道工作”。听取不同意见，有助于提高组织工作质量，更能减少决策失误。对提出的意见是否采纳，应有研究、有回应；对没有采纳的意见，应说明理由；对持保留意见的成员，应允许其按照组织程序继续反映。这样，党内民主才能成为改进决策的实际力量。

严格执行领导班子决策议事规则

领导班子决策议事规则，是民主集中制在领导工作中的具体体现。集体领导和个人分工负责相结合，要求凡属重大问题都要按照集体领导、民主集中、个别酝酿、会议决定的原则，由集体讨论作出决定；决定形成以后，班子成员根据集体决定和分工履行职责。个人不能包办重大问题，集体也不能替代个人应当承担的日常工作责任。把这两个方面分清楚，才能防止独断专行和推诿扯皮。对重大决策、重要人事任免、重大项目安排和大额资金使用事项，应逐项明确决策权限和监督方式，防止拆分事项、降低标准、规避集体决策和监督。科学决策、民主决策、依法决策，需要必要的调查和论证作支撑。《决定》把调查研究、科学论证、风险评估和合规合法性审查列入重大决策程序，表明集体讨论并不能代替决策前的准备。个别酝酿只能用于沟通情况、交换意见，不能变成会前定案。上级党组织作出同下级党组织有关的重要决定，一般应当事前征求下级党组织意见，也是为了避免决策脱离实际。

《决定》明确提出，重要议题出现较大意见分歧时不得强行作出决策。这一要求同少数服从多数并不矛盾。少数服从多数解决组织如何形成决定的问题，但不能以简单表决代替充分讨论和审慎论证。分歧较大，往往说明情况尚未查清、论证尚不充分或风险认识不一致。对少数人的意见认真考虑，对重要分歧慎重处理，才能使集中更加正确。集体决策还要防止议而不决、决而不行、行而不实。研究工作时，班子成员应充分发表意见；决定形成后，则要一抓到底。个人有不同意见可以保留或按程序反映，但不能因此拒不执行。执行中发现新情况，也应及时报告，按照组织程序研究处理，不能机械照办，更不能擅自改变集体决定。

领导干部要服从组织决定和组织分工，按照党中央精神和集体决策在职责范围内履职尽责。《决定》强调，坚决反对和防止以党委（党组）集体决策名义集体违规或逃避责任。集体研究不能成为违规决策的挡箭牌，集体负责也不能变成无人负责。健全领导干部重大决策终身负责制，需要把责任落实到决策过程之中。会议主持人要对是否按规则组织讨论负责，议题提出者和分管成员要对调查论证负责，班子成员要对本人发表的意见和表决负责，执行者要对落实集体决定的情况负责。终身负责不是把全部责任归于主要负责人，而是使参与决策和执行的每个人都对自己的行为负责。

严格规范“一把手”履职用权

“一把手”是领导班子的主要负责人，民主集中制贯彻得怎么样，关键看领导干部特别是“一把手”做得怎么样。《决定》提出，选拔任用“一把手”注重考察贯彻执行民主集中制素养和能力，把监督要求提前到选人用人环节。专业能力再强，如果不善于实行集体领导，也难以胜任“班长”的职责。规范“一把手”履职用权，需要把作为“班长”和作为集体一员的角色分清。作为“班长”，要组织讨论、集中意见、推动落实；作为集体一员，则不能把自己的意见当成集体决定。《决定》要求执行“一把手”末位表态制，就是防止主要负责人先定调、其他成员跟着表态。末位表态并不是减轻“一把手”的责任，它为充分听取意见、再作归纳和决断创造了条件。听得多一些、全一些，最后的集中才可能更准确。

书记专题会议不得代替党委常委会会议作出决策，该由集体研究的不得擅自表态，不得用个人意见代替班子集体决定，不得擅自改变集体决定。这些规定划出了明确的权力边界。尤其需要警惕以“维护班子团结”“维护主要负责人权威”为名，使不同意见难以表达。《决定》明确不得层层要求维护“一把手”个人权威，要维护的是组织权威和制度权威。集体决定不能随个人好恶改变。落实加强对“一把手”和领导班子监督的制度规定，落实“一把手”述职专题报告管理监督下级“一把手”情况制度，落实党委（党组）对下级党组织“一把手”开展监督谈话制度，体现的是上级党组织的监督责任。完善同级监督制度机制，班子成员也有维护民主集中制的政治责任，发现“一把手”存在问题应当坦诚提出，发现重要问题应当向上级党组织报告。同级监督体现着对党和事业负责的态度，不能把它看成无原则纠纷。把上级监督、同级监督和日常制度执行结合起来，才能及时发现个人专断、先定后议等问题。规范用权不是让“一把手”不敢负责。该由集体研究的，不能个人决定；该由个人分工负责的，也不能推给集体。民主集中制既约束擅权妄为，也反对逃避责任。把权力边界划清，把议事程序执行好，把应负的责任承担起来，“一把手”才能真正当好“班长”，领导班子也才能形成既有民主又有集中的工作状态。

〔作者系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文史教研部主任〕